

張學良 盧鳳閣

爱国主义者張學良先生
是怎样成了“不抵抗將軍”
后来又怎样成了“兵諫”英雄的？
盧鳳閣口述 胡麟生整理

引言

一提起張學良先生，人們很自然地便会联想到中国現代史上的两次重大事变：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瀋陽事变（简称“九·一八事变”）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。在这两次事变中，張學良先生都是一个主角，但是他所扮演的角色，却前后判若两人。在九·一八事变时，他是“不抵抗將軍”，忠实执行蔣介石“绝对不抵抗”的命令，替蔣捐了几年骂名。事隔五年之后，到西安事变时，張學良先生却又成了敢于扣留蔣介石、实行“兵諫”的英雄，逼蔣接受中共“停止内战，联合抗日”的主张，为全国人民所敬佩。这一毁一誉，本来是很自然的。但是由于張學良先生，在替蔣介石受责难的那几年当中，他并没有作过任何申辩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，又一直为蔣介石背信弃义所拘禁，使他在抗日战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，以及建国以来，都不能有所作为和表现。所以有些人就往往以这两次事变，定張學良先生一生的功罪。这却是不全面的，也是不公平的。至少我们必须了解：張學

良先生在九、一八事变以前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支配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？他是怎样成了“不抵抗将军”的？然后结合从九、一八事变，到西安事变的经过，说明他又是怎样成了“兵谏”英雄的。这样我们对张学良先生，才能有一个比较全面、比较正确的认识，作出一个合乎历史实际，合乎张学良先生思想实际的公正评价。

我从一九二七年起，给张学良先生当警卫，追随他多年，直到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先生被扣，东北军为蒋介石所瓦解。我才留学伪陆军大学当教官的。对于张学良先生这十年（从一九二七年到西安事变）所作所为，言行思想，都比较了解一些。至今我仍怀着崇敬的心情。我从良心的各种事实，写出自己的经历，耳闻目睹的种种事实，写起出来公诸于世，以供读者对张学良先生作出正确评价之参考。

张学良的父亲是讲武堂第一旅长、师长，他完全是在东北长大的。到他部下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个军团的总司令了。张学良是：张作霖未死前，张学良完全是在东北长大的。到他部下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个军团的总司令了。张学良是：

第一军团孙传芳，第二军团张宗昌，第四军团韩麟春，第五军团张作霖，第六军团吴俊升，第七军团褚玉璞）。当时我是东北讲武堂的入伍生，按规定先到部队实习一年，便到了张学良的卫队旅，旅长为王以哲。

张学良少年得志，但是很虚心。他起初升任旅长的时候，便向张作霖要求，派在讲武堂教过他的老师郭松龄（陆大^{四期}毕业，据说是共产党员）帮助他，但又不愿屈居于他之下，所以也为郭松龄要了一个旅长。他是混成第二旅，郭是混成第六旅，两旅合并，称为“二·六旅”，由郭老师主持一切，张学良则在旁见习。直到两人同当军长，都是如此。郭松龄是有新思想的人，对于部队力加整顿，首先抓教育和任用干部。二·六旅办了个军官教育班，学员毕业后，便由两个旅长带到各营连去，命令营连来的连队长，带队到操场集合，当面出题目（指示假想情况），叫营连来的连长即时用口令，叫排班作出相应的动作。如果这个措施，不合乎当时的要求，也就是不合乎操典的营连，则便认为不堪胜任，还得学习，即时将肩章（即军阶）摘下，挂在跟在后面的某一新毕业的学员的肩上。这个学员就成了这个连队的正式负责人了。对于撤换下来的人，也不遗弃。有文化化的可以进军官教育班，以后还是可以官还营

职，没有文化的就当附员。他们这种破格用人的措施，使东北军由一贯崇尚大老粗，一变而为崇尚学术科。人人都以能进军官教育班或东北讲武堂为荣。

在郭松龄这样大力整顿之下，他二人的部队就在东北军中，形成一支新兴的力另。一九二五年冬，郭松龄因受西北军冯玉祥将军进步思想的影响，率领这支新兴力另，由天津打回东北，声称要推倒张作霖，拥护张学良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旧东北军望风披靡（当时报纸称这次事件为郭松龄倒戈）。郭氏部队逼近沈阳，张作霖已准备携眷逃往东山。这时，驻沈阳^日军由于知道郭松龄的思想比较进步，惟恐郭氏上台后于日本不利，乃向张作霖提出条件，要张答应日本修通吉（林）会（宁）等五条铁路，日方便保证不让郭松龄部队通过南满铁路（当时係日本经营，并享有在铁路线附近10公里内，中国军队不得作战的特权），这就使郭氏部队无法进攻沈阳。张作霖当时迫于形势，口头答应了（事后借口国民反对，不肯签字兑现）。在日本关东军的干涉下，郭氏部队很快瓦解，郭氏夫妇（郭松龄之妻韩淑秀，与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，係北京师大同学，思想也较进步）便衣逃走，为避追骑，止于一农户家地窖内，因在地窖上遗落一张名片，被搜出逮捕

。張作霖為了^不讓張學良為郭求情，便命令就地槍決了。並將郭心肝挖出祭陳亡將士，陳尸三日示眾。陳尸當尸告也要登。對郭氏的報復，照樣升官。升任第三軍團長後，他又和同郭松齡（日本合像二、六旅一任沈陽兵工廠長），搞三四聯的像士官生，實行聯合辦公。辦公室、講堂懸掛的像軍片，都是張韓合夥。張學良這種作法，從好的方面說是虛心，從壞的方面說則是依賴，造成他後來幻想依賴蔣介石成事的心理基礎。

總之，在張作霖未死以前的張學良，真是大樹腳下好遮陰，沒有經過任何風雨，就一帆風順、青云直上的升官、再升官，二十歲就升到軍團長。這也可以說是他一生的黃金時代。

二 張作霖之死

張學良遭到的第一場暴風雨，是突然襲來的，這就是他父親張作霖之死。

在上述郭松齡事件中，日本軍人由於給張作霖幫了大忙，而張答應日本的修路權，却一直拖賴不肯兌現，因此對張極為不滿，陰謀把他除掉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，張作霖從東北^{奉天}回沈

阳，乘着慈禧太后的龙车（义和团事件，八国联军破北京，慈禧逃到陕西，后来由西安回北京时，专门做了一辆龙车，上面雕满金龙，金光灿灿，以显示她的威风荣耀），到了沈阳附近皇姑屯，专车照例是不停车的，这天忽然停车片刻，当时有张的总参议和宇建，和铁岭局常荫槐二人下车而去，专车继续开行不远，小地名老道口，即被日军预埋的大炸药所炸毁，张作霖当时炸死，同车尚有张的把兄弟、黑龙江省长吴俊升（绰号人称吴大舌头）。亦同时毙命。时间是凌晨五点三十五分。噩耗传到沈阳，张学良志到事态严重，为了防备日军乘张作霖身死、群龙无首之际，发动突然袭击，当机立断，严密封锁消息，宣称张作霖仅係炸伤，每天伪造伤情报告发表，谢绝日方人员前去探望。这样搞了一个星期，等到各种防卫措施，大体部署完成，才宣布张作霖死的消息。并由东北军各高级将领开会，一致公推张学良继任父职。张学良就任东北四省（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热河）保安总司令，时年二十八岁。

这样一来，一直躲在大树脚下遮阴的张学良，一下子本身成了要顶住风吹雨打的大树。张学良心怀父仇，为了顶住日本的侵略势力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威仪地位，最首要的便是要对

东北军大加整顿，特别是要肃清东北军内部的亲日派，实为当务之急。所以在这年冬天，张学良便借开会为名，枪杀了勾结日本人暗害他父亲的相宇霖、常荫槐两个坏蛋。张学良的权力也就进一步稳固了。

三 张学良和日本人打的两次交道
一九二八年六月，张学良就任东北四省保安总司令后，日本特使林权助，曾设宴招待张学良。席间老奸巨滑的林权助，故意很不郑重地问：“总司令年龄几何”？以试探张之反应。张学良听了，认为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轻蔑，也是对中国的侮辱，并不置答，立即针锋相对地反问：“请问贵国天皇贵庚几何”？林氏愕然，方知张学良是不可轻视的。

同年十一月间，日本总领事又在其警卫森严的馆舍，请张学良赴宴。这个宴，其实是个“费门宴”。日方准备旧话重提，逼使张学良在其父答应日本的修路权一事上签字。张学良在事先亦有所闻，但不去又不行，既有失外交上的礼貌，又显出己的懦弱。张学良去赴宴那天，出动了近千名便衣警卫，我当时是他手枪连第一排第一班的班长，自然也奉命参加了这次保卫工作。上面给我们的任务是：严密注视总领事馆内外的动静，并严防日本及朝鲜浪人捣乱行刺。张学良事先又派人开了一辆小

轿车，停在总领事馆门外，车上不留一个人，以免引起日军的注意，自己带着钥匙，作为预备车。这样布置妥当，他才坐着汽车，对张学良便藉口入厕，从便门出馆，走上了预备车，逡巡自开车而去。我们看见总司令走了，也就撤回连去。当天张学良犒赏了我们连一头猪肉。

这两件事，事情虽小，但是直接和日本人打交道，颇能说明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。

四 东北易帜

一九二八年冬，东北易帜，就是说的东北归附了南京的蒋介石政府，取下了原来的五色旗，换上红底青天白日旗。东北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。张学良被任命为边防军总司令。原来东北军的十五个师，改编为十五个旅。奉天省改为辽宁省。文官简任以上，军官校级以上，均加入国民党，成为国民党正式党员。

这样的事，要是张作霖在世，是绝不肯干的。首先，张作霖以东北王自居，决不肯屈居蒋介石之下，自己的干部，去加入别人的什么党，他也不愿自己呐喊。但是，张学良却这样干了。所以他替别人当东北，流行一句民谣：“要了统一，丢了爸爸”。就是说，张学良东北易帜，违背

，都是东北兵工厂自造。装备连有轻机枪四班，营有重机枪连，团有平射、曲射砲连，通信排等。十五个师（后改称旅，人数未减），共二十余万人，尚有少量空军和海军。实力本不小。但日本在东北拥有殖民特权，驻有关东军，控制南满铁路，侵略势力已经插进东北心脏。因此，根据他父亲在东北几十年的教训，仅以东北一隅的力量，是不能对付日本的侵略的，必须要有全国的力量作后盾。张学良一贯依靠他父亲，依靠郭松龄，依靠韩麟春，依靠惯了，这时便产生了依靠蒋介石的幻想，这是他后来一错再错的根源。

五 中东路事件

俄国以前在东北，也和日本一样，拥有种种殖民特权（其实日本有些特权，以前是没有的。是一九〇五年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场日俄战争。战胜俄国后，未经中国政府同意，直接由俄国接替过去的）。后来十月革命成功，列宁主动宣佈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，自动放出这些特权。只是中东铁路，因为是俄国出钱修的，又关系它远东运输至巨，所以苏联保留了管理权。规定中苏双方各派理事若干人，组成理事会。理事长由苏方担任，中国人作副理事长。一九二九年，蒋介石忽然提出异议，要设两个理事长，中苏各佔一席。苏方不同意。

· 他就要强制收回中东铁路，并不惜诉诸武力。
· 蒋介石这样做，当然不是为了爱国，而是为了反苏反共，向帝国主义讨好。

当时南京提出强硬外交，要张学良以武力作后盾。张便派了两个旅进驻海拉尔，陈兵苏联边境，以示威吓。当时正值隆冬季节，边境气温低到摄氏零下四十二度，中国兵不耐严寒，都躲在地道里烤火取暖，不敢出外。被苏联人知道了，派了一个骑兵团前来偷袭，东北军两个旅被消灭，两个旅长一个战死（韩光第），一个被俘（梁忠甲，不久也死了）。中国派莫德惠到苏联谈判，毫无结果。直到九、一八事变发生后，日本佔了东北，这件事才不了了之。

这件事，当时就有人说：“这是蒋介石藉外力消灭东北军的奸计”。但张学良并不介意。他有他的目的，他是想借此机会表演一下。一方面是给蒋介石看，他对蒋介石是言听计从的，今天他以武力为南京政府的外交作后盾，希望南京政府今后也能以外交为他的武力作后盾。另一方面是给日本人看，他和南京政府是一致的，南京政府是能采取强硬外交的，他是不惜以武力作后盾的。戏正是这样演的，花点本钱也就不介意了。

六 蒋、冯、阎大战

一九三〇年五月，蔣、馮、閻大戰發生，各方說客云集沈陽，閻錫山代表中，閻錫山代表張學良，蔣代表傅作義，此外還有一些其他軍閥的代表。張學良則派以觀變，陳兵山海關，自己則駐在北戴河，一面是看火色，一面是講價錢。在一次閒談中，張學良談到他的“惡政府”被四川代表鄧錫珩所見了，立即趕回北平，擴大會議，決不可去參加”。這句話不但透露了張學良決定的要支持蔣介石，而且也說明了他為啥要這樣作的原因。從東北易幟起，張學良就是把蔣介石當作國家和政府的化身。這句話就是說，蔣介石再不好（惡政府），也應該支持他。如果蔣介石垮台，國家就會群龍無首，陷于四分五裂（無政府）。

果然，在蔣、馮、閻中大決戰的時候，張學良出兵了。東北軍第一軍（軍長王樹勳）腹背受敵。駐在北平的閻錫山部三十二軍（軍長韓復榘）首先向東北軍輸誠，接着馮玉祥的又按兵不動，接受了蔣介石給他的山東省主席的任命。馮、閻因此失敗，閻錫山退

回山西老巢。冯玉祥下野上泰山读书，一场大战就此结束。

这次张学良给蒋介石帮了大忙，使蒋转危为安。蒋介石给张的酬庸，就是提升张为陆军副总司令。行营设在北平，张即常驻川。于此。这时，张学良年未三十，便当了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，成了蒋介石的副手，常志川驻节，自视甚高，眼光也就不再局限于东北一隅，而俨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了。张学良后来毫不吝惜地放弃东北，实为此有关。

就在九、一八事变的前一年，蒋、冯、阎大战刚结束的时候，一九三〇年九月九日，东北讲武堂迁宁本校，举行第十期毕业典礼，张学良当着二千八百多学员，还有不少来宾（冯、阎代表）门致词，傅作义也在场），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总而言之，你们要不惜一切牺牲，保卫国家的领土，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。我是带你们每一个人，都有可以打我一枪”。我是十期学员，在发生他的命令，而忘了自己这番誓言。九、一八事变时，我在沈阳，

一九三一年九、一八事变时，我在沈阳，

任东北讲武堂第十一期通信教官。当时沈阳北
大营驻有步兵第七旅（係师改编，旅长王以哲
）。全旅约万人。东北唯一的战车营，也驻在
同一营区。此外驻在沈阳的部队，还有砲兵旅
、工兵团、宪兵、警察大队等。我们东北讲武
堂有学员约二千人，都是现役军官，讲武堂附
属的教导队约有千人，都是现役军士或上等兵
。加上平素所受的以日军为假想敌的军事训练
，对日军的侵袭，不但有战志，而且也是有一
定的抵抗力的。所以，当最初听到^柳条沟地雷
爆炸声响（这是日军制造的借口，自己炸毁铁
路，反诬是中国人的干的。也是日军发动侵袭的
信号），不少部份都吹起紧急集合号，全副武
警待命行动。我们讲武堂也吹了紧急集合号，
我当时便叫七十名学兵，带好枪枝弹药，集中
待命。不久，忽叫全体集合，由一个总队长（
陆军少将）董舜臣当众宣布：“北平上级来的
命令，把武器收回库房上锁，每个人徒手待命
。万一日本人来了，就是牺牲，也不许抵抗。
（大意如此，原文记不清楚了）。并说：“军人
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任何人不得违抗，违者
严惩不贷”。我当时听了，心里非常诧异，首
先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这样作？其次，军人把
武器交了，徒手还待什么命？思想搞不通，就
是不执行。我叫学生们把枪弹保存起来，且看

下一步。第二天（九月十九日），所谓“徒手待命”的命令果然到了：“各部份徒手整队往东撤退”。我带了七十个学生，就是带着武器走的，并且吩咐学生们：“如果日军逼近就开枪，追责任我承担”。那天走时（上午十时许）的情形，真是令人痛心愤慨，日机在头上盘旋，日骑在地上奔驰，徒手成队的中国军人，沿沈海铁路线络绎不绝的逃窜。是战败了吗？不是！这是为了什么啊？我的心情非常沉重，感到可耻，可悲，可愤！

当晚到灰山镇宿营，为了防备日军夜袭，讲武堂另一位总队长王静轩，召集各队领队人员开会，佈置夜间警戒，因我的队伍有武器，便担任对敌人进出方向的警戒，但仍一再告诫：“非万不得已，不许开枪”。仍念念不忘“绝对不抵抗”的命令。一路上，就靠我带的这七十条枪，成了全体的保镖队。夜间偷越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时，要我先派一个班作挺进哨，越过后还要我留一个班作掩护。过辽河后土仁很多，要我对付。有些村庄老百姓看见徒手兵，认为是溃兵，不卖给粮食，不让进村庄，也要我这支武装整齐的队伍，才能把交涉办好。直到十月一日到了漳武县，向铁路局交涉到北平的车皮，铁路局也是因看见我带的队伍有武器，才很快的拨车，挂在直达北平的快车

上。

十月三日上午到达北平前门车站，指定我们到旗坛寺营房暂住。老百姓因为我们是从沈阳来的部队，都来看，发现我们带着武器，认为与报上“武器锁库不抵抗”的传说有出入，问我们，我们也不便多说。带枪的事，被行营主管当局知道了，当天晚上便派人来，乘我们酣睡之际，先在门口架起机枪，然后进屋把我们七十枝步枪，万余发子弹都收走了。第二天早上我还未发觉，上厕所碰到一个小同学，他才告诉我：“你们被缴械了，好在你们没有反抗，算是和平解决。否则恐怕性命还危险哩”。我回屋一看，果然枪弹都不翼而飞了。我想这件事真越来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：平时教育我们，不惜任何牺牲，都要保卫国家领土主权，真正敌人来了，却又不准我们抵抗。武器是军人的生命，在东北不准带走，说是怕打死日本人，我带点武器，沿途保护自己，已经到了北平，还缴了我的械。我越想越想不通，便决心回热河朝阳县老家去，组织民众打游击。我去向王以哲谈了，王也很赞成，我便回家去了。

王以哲的第七旅，从沈阳出来，也是执行的“绝对不抵抗”的命令。但是也有二营人，在日本人来了的时候，取出机关枪来，封锁

日军进出的道路，打死了几个朝鲜人和日本人。这二营人都进入东山林区打游击去了。十月底，第七旅大部到达北平，驻在清河镇。陆军中学的大楼。补充人员、武器。很快又恢复了旅的面貌。

九、一八事变，点燃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怒火。当时全国舆论，对张学良这样一个拥有雄兵三十万，守土有责的将军，在日本人来了的时候，竟然交枪弃械，白白地送给日本，使四万万东北同胞，沦为日本人的奴隶，颇多责难。事变发生的时候，张学良正在研究对策，随口便说：“绝对不抵抗。”这个命令是谁下的？像这样不近情理的说法，张学良也未作过任何申辩。难道没有认真追查清楚，有些人反而要求蒋介石惩办张学良，像这样的命令，张学良是不敢擅自作的。即使他要命令部队不抵抗撤退，也不会有什么后果。把交总司令又是怎么样？反过来说，如果这个命令真是张学良下的，那末他退下来后，蒋介石何尝会根据张学良平素的言行思想，他